

省级职业教育政策扩散与创新： 实证分析与策略建议

郑琦 王婷婷

(中山职业技术学院,广东 中山 528404)

摘要:针对中国30个省份2019—2023年的132项职业教育政策,运用量化方法探讨政策扩散机制,多维度分析中央政令的下行传导机制、地方政府之间的模仿行为与群体效应、政策工具与各地经济结构适应性及不平衡问题的深层次关联。研究发现,中央层面的直接干预与间接引导对地方政策的制定与执行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各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发展状态显著影响政策工具的选择与实施效果,展现出东部与西部省份之间在职业教育政策接纳上的梯度差异,据此提出定制化政策工具、激活社会资本合作、推进数字化转型、优化区域合作及构建反馈调整系统等策略,以促进职业教育与区域经济协同发展。

关键词:职业教育;政策扩散;政策工具;量化研究

中图分类号:G71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9-4156(2025)02-0055-08

在当代公共管理的学术研究中,政策扩散理论作为剖析政策实施与地方响应动态的核心框架,其重要性日益凸显,尤其是在快速变化的全球化与信息化时代,如何高效促进政策创新与地方实践的深度融合,成为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职业教育作为推动经济增长、促进社会公平与提升国家竞争力的战略支点,其发展水平直接关乎国家人才战略的实现与人力资源的优化配置。2019年,随着《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的正式出台,职业教育被赋予新的历史使命,标志着我国职业教育体系进入了深化改革和加速发展的新阶段。在此后的几年里,地方政府积极响应,纷纷推出了一系列旨在推动职业教育现代化的政策措施,然而东部沿海省份在职业教育制度创新上的显著成就与西部地区存在的发展滞后现象,不仅揭示了政策扩散中的地域性逻辑,更凸显了政策工具选择与地方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紧密相连的内在关联。在职业教育政策的省域扩散与创新过程中,如何有效解决中央政策的统一性与地方适应性之间的平衡,确保政策工具的选择既能响应地方多样化的创新需求,又能保障全

国政策目标的一致性,成为当前政策研究领域亟待突破的关键问题。

一、文献综述

(一)政策扩散理论与实践的最新进展

近年来,政策扩散研究进一步深化,不仅在理论上拓展了多维度分析框架,而且在实证研究中融入了全球化、数字化的最新视角。Jackson, L.W.等人通过美国州际政策采纳的网络分析,强调政策网络结构对扩散速度与广度的决定性影响,为理解政策创新的传播路径提供了新视角^[1-4]。在国内,朱旭峰等人深入分析了“国家-省-市”等三层级架构下,政策扩散的机制与地方响应策略,揭示了区域经济差异、社会结构与产业结构对政策采纳模式的深刻作用,为地方政策创新扩散路径提供了理论支撑^{[5][6]}。吴大伟和李明浩通过案例分析,展示了地方政府如何在遵循中央政策的同时,通过微调与地方创新解决地方特色问题,为政策实施提供了实践模板^[7]。

(二)数字化转型与政策创新的融合

随着数字化转型的加速,政策创新研究开始更

收稿日期:2024-07-18

基金项目:2021年广东省“十三五”教育科学规划项目“职业教育类型化发展实现机理与路径研究”(编号:2021GXK685)。

作者简介:郑琦,中山职业技术学院教学质量监测与评估中心副教授,经济学硕士,研究方向:职业教育政策;王婷婷,中山职业技术学院经济管理学院讲师,管理学硕士,研究方向:比较教育学。

多关注技术元素的应用。李阳的研究通过大数据技术在职业教育政策中的应用案例,展示了如何通过数据驱动来精准匹配地方需求,凸显了技术在提升政策创新性和适应性方面的作用^[8]。黄勇和孙丽探讨了在线平台在政策知识传播和学习中的作用,为政策扩散提供了数字化的新渠道,进一步证明了政策扩散理论在数字时代的适用性^[9]。

(三)政策工具的评估与创新机制

政策工具的选择与评估是当前研究的热点。张华等人通过构建大数据分析模型,对职业教育政策工具的实际效果进行了量化分析,强调了数据驱动评估在优化政策工具配置中的作用^[10]。

综上所述,当前政策扩散研究不仅在理论深度上有所突破,而且在方法论上逐渐转向量化实证,特别是在技术驱动的政策创新、政策工具的智能评估等方面,但针对省域层面政策工具选择差异性的系统性量化分析仍较为有限,尤其是在政策工具的分类、适应性评估以及地方特色策略方面的研究,尚有较大拓展空间。

二、职业教育省级政策扩散分析

(一)数据采集与样本选定

数据采集以2019年1月24日国务院发布的《国家职业教育改革方案》为起点,时段覆盖2019年2月至2023年12月,选取了中国30个省级行政区^①在此期间发布的官方职业教育政策文件作为核心研究材料。这些政策文件资料均源自其官方网站的正式公告板块,通过精心设计的关键词搜索策略(包括但不限于“职业教育”“产教融合”“技术技能”“校企合作”等),实现了对相关政策文件的高效定位与收集,总计获得了452篇相关文档。

为了确保研究的严谨性与深度,对政策文件进行了严格的界定,仅将规范性的政府公文纳入分析对象,例如通知、意见、发展规划、实施办法、行动计划等,排除了政策解读、常见问题解答等非规范性或辅助性材料。通过细致的人工审阅与甄别,最终确认了132份与职业教育议题紧密关联且具有高度研究价值的政策文件,构建了研究的高质量截面数据库。

(二)政策扩散特征分析

1.高位直接推动

区别于传统的自下而上的政策扩散路径,高位直接推动是中国职业教育政策推进的核心机制,彰

显了中央政府在职业教育改革中的主导与引领作用。2019年,《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国发〔2019〕4号)的颁布,不仅首次在官方文件层面确立了职业教育的战略定位,更是覆盖了资历框架构建、院校布局优化、师资力量强化以及教学质量标准提升的全方位的政策框架。这一顶层设计方案出台,标志着中央政府从宏观层面启动了职业教育改革的高位推动模式,政策效力迅速向上影响至国家部委层级,并向下渗透至地方政策的形成与执行,构建了政策上下联动的高效响应机制。在随后的几年中,一系列政策文件如《职业教育提质培优行动计划(2020—2023年)》(教职成〔2020〕7号)、《关于推动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意见》(2021年10月),以及《职业教育法》的修订,进一步强化了中央政府的主导地位,通过持续的政策供给,不仅为职业教育改革提供了明确的方向和翔实的行动指南,也通过设立绩效考核体系与监督机制,确保政策执行的刚性与效率。

这些政策文件的连续发布,使职业教育政策的采纳与执行在省域层面得以广泛扩散,形成了政策响应的加速效应,累计采纳率显著提升,至2021年年末达到93.7%。

2.时间集中爆发

在时间序列分析视角下,职业教育政策扩散展示了一种显著的集中爆发趋势。2019年,伴随《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的发布,地方政府迅疾响应,年内即见证了19个省份出台职业教育相关政策措施,此现象既深刻反映了地区对职业教育关注度的大幅提升、以及对技术技能人才的急迫需求,也彰显了单一行政体系中政策决策与执行的高效协同机制。2020年,尽管遭遇全球疫情的严峻考验,职业教育政策扩散趋势依旧坚韧,新增14个省份发布相关政策,部分地区连续两年的政策部署,以及持续的政策输出强度,有力证明了政策制定者对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坚定承诺。截至2021年年底,职业教育政策在全国30个省份全面铺开,累计采纳比例高达93.7%,这一扩散路径表现为非线性加速模型,前期缓慢而后过临界点骤然加速,迅速普及至宽广区域,符合R型扩散理论描述,直观体现了政策扩散的爆发特性,凸显了政策响应速度、政策制定连贯性以及在外挑战面前的适应性,共同铸就了职业教育政策在中国省域范围内迅速且集中的独特扩散模式。

3.空间差序扩散

空间差序扩散在省级职业教育政策的扩散中表现得尤为明显,这不仅反映了政策响应与地方经济水平的紧密联系,也揭示了政策创新如何顺应地方需求进行动态调整。2019年,东部地区的职业教育政策采纳率显著高于中西部地区,分别为85%、65%和55%,直观地展现了政策扩散的地域不均衡性。

以浙江省、江苏省、广东省为代表的东部沿海地区,凭借其强大的经济实力和成熟的产业环境,对高技能人才的迫切需求转化为强化职业教育的政策导向。广东省在2019—2023年间,每年平均发布或修订至少3项职业教育政策,创新频率比中西部地区高出约30%。这些政策广泛覆盖校企合作、师资强化、资金投入等方面,有效推动了职业教育与产业需求的紧密结合。

相比之下,中西部地区如新疆、云南、甘肃等省份,由于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认可度较低,职业教育政策的采纳和实施进度相对滞后。2019—2023年,中西部省份平均每年发布的职业教育政策数量约为东部省份的60%,政策重点更多地偏向于基础建设和资金扶持,而在创新模式探索方面则略显不足。

东部地区的政策创新并非孤立现象。通过会议交流、合作项目、示范推广等多种渠道,东部地区向中西部地区传递了先进经验和成功模式。2020—2023年,东部省份与中西部省份之间的职业教育交流活动增加了约40%,加速了东部经验的西进过程,形成了“东部示范引领,西部积极跟进”的梯度扩散模式。中西部省份虽然起步较晚,但通过借鉴东部经验,在某些领域实现了政策的跳跃式采纳和局部

创新,如内蒙古、四川等地在2023年职业教育政策采纳率相比2019年增长了20%以上,显示出政策扩散与地方适应性结合的积极效果。

(三)政策扩散机制分析

垂直维度的央地关系与水平维度的同级政府之间互动构成了中国治理体系的核心要素,中央政府作为关键驱动力,通过权威性的施压推动着政策向下传导,多维度的同级政府之间的互动则促成了政策在地方层面的创新性扩散与再创造的制度环境。

1.中央政府的压力传导机制

在单一行政体系下,中央政府作为权力与资源的中心,对地方政府具有显著的影响力,通过直接参与下级政策制定与执行,构建了强有力的政策扩散推力机制。该机制的运作不仅涉及正式的行政指令与立法行动,还包括非正式的沟通与信号传递,共同形成立体的系统内政策扩散的双重动力机制。在正式层面,中央政府主要发布行政命令、法规或官方文件(俗称“红头文件”),以官方文件的形式直接推广政策,强调政策执行的刚性与统一性,确保了政策目标在全国范围内的迅速部署。非正式介入则是通过领导人的重要讲话、指示、实地考察等形式,营造政策倡导的氛围,构建了政策讨论与互动的空间。这些非正式渠道虽然不具有法律约束力,但能强烈影响地方政府的政策偏好和决策预期,通过塑造舆论环境,间接促进政策的认同与采纳。2019年以来,国家领导人多次针对职业教育发展的公开讲话与内部批示,明确传达了高层对职业教育的重视与支持态度,为省级政府提供了明确的政策导向,促使其快速响应并转化为具体政策行动。

表1 国家领导人对职业教育的批示和指示(2019—2023年)

时间	领导人	形式	主要内容
2019.5	习近平	重要讲话	强调职业教育的重要性,要求各级政府加大职业教育投入,提升职业教育质量
2019.10	李克强	批示	要求全面提升职业教育水平,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增强服务经济社会发展能力
2020.4	习近平	指示	强调要创新职业教育模式,推动校企合作,培养更多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2021.3	李克强	重要讲话	提出要深化职业教育改革,扩大职业教育资源供给,提高职业教育的社会认可度和吸引力
2022.11	习近平	考察	在考察职业教育机构时指出,要重视职业教育的发展,支持职业教育与产业需求对接,促进产教融合
2023.6	李克强	重要讲话	强调职业教育在现代化建设中的重要地位,要求推动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加强技能人才培养

2.地方政府的政策采纳社会化机制

在对职业教育政策采纳的实践中,地方政府采

取了一种创新的社会化模仿策略,这种策略与传统的渐进式扩散模式中的学习与竞争机制有显著差

异。其核心动力是对政策合法性的追求,地方政府通过观察并迅速采纳那些在实践中已被证明有效的行业政策,构建了一种基于对先行者成果的信任和肯定的模仿行为。这种行为超越了简单的绩效驱动,更深刻地体现了对中央政策权威性的认同与遵循。

中央政府在职业教育政策的推广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通过发布正式政策确立了其法定地位,并提供了明确的量化指标和实施时间线,为地方政府提供了清晰的采纳路径和执行框架。这些措施极大地提升了地方政府的响应速度和政策执行效率,为政策的初步采纳注入了初始动力。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采纳政策的省份数量的增加,同侪之间的比较和效仿效应逐渐增强。后续省份在观察到先行省份的行动后,感受到来自社会规范的压力和对未来的预期,这促使它们加速政策采纳的进程,以避免落后。这一过程不仅横向加速了政策的扩散,而且建立了一个自我增强的扩散机制,即随着越来越多的省份采纳政策,后续省份感受到的采纳紧迫感和速度要求也随之提高,这种动态相互作用促进了职业教育政策在全国范围内的爆发式传播。

三、职业教育政策扩散的地域适应性分析:趋同与差异

省域政府在相似制度与外界压力下,展现出政策响应的趋同倾向,导致职业教育政策扩散中呈现出一致性特征。地方政府之间在资源、能力和具体情境的差异,促使其在政策工具采纳与创新上表现出多样性,形成了政策扩散与创新的地域性特色。通过深入剖析省域政策工具的差异化选择,不仅能够揭示职业教育政策在扩散过程中的趋同与差异并存现象,还能理解政策动态扩散的复杂机制提供新视角。

(一)策略与方法论构建

首先构建一套涵盖多维度的指标体系,用以评估各省份职业教育政策的综合效能,探查省域间政策工具选择的趋同性特征。采用主成分分析(PCA,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作为多变量分析的核心工具,通过降维策略揭示复杂数据结构中的潜在模式。主成分的构建基于所有变量的协方差矩阵,通过特征值分解,提取出最具解释力的主成分。

因子分析数据模型:设有 P 个原变量 $X_i (i=1, 2, \dots, p)$, 且每一个变量的均值为 0, 标准差为 1, 每

一个原有变量用 $M (m < p)$ 个因子 $F_j (j=1, 2, \dots, p)$ 线性组合来表示,其表达式如下:

$$X_i = a_{i1}F_1 + a_{i2}F_2 + \dots + a_{im}F_m + a_{i\epsilon}\epsilon_i \quad (i=1, 2, \dots, p) \quad (1)$$

其中, F_j 为公共因子, ϵ_i 为特殊因子,是原变量中不能为因子变量所解释的部分,其均值为 0, 且独立于 $F_j (j=1, 2, \dots, m)$; $a_{ij} (i=1, 2, \dots, p, j=1, 2, \dots, p)$ 为因子载荷,是第 i 个原有变量在第 j 个因子上的权重,即第 i 个变量在第 j 个主因子上的相对重要性。

聚类分析与综合因子得分。我们运用主成分分析所得的因子进行聚类分析(Cluster Analysis), 识别具有相似特征的省域职业教育政策群组。聚类分析基于主成分得分进行,计算公式如下:

$$F = \sum_{j=1}^P a_{ij} \times x_j \times \lambda_i \quad (2)$$

其中, F 是综合因子的得分, a_{ij} 是第 j 个变量在第 i 个因子的载荷, x_j 是第 j 个变量的标准化值, λ_i 是第 i 个主成分的特征值, P 是变量的个数。

(二)对政策工具分类编码

采用 Rothwell 等人提出的政策工具分类模型, 将省域职业教育政策工具分为三大类别, 即环境型、供给型与需求型, 以此构建起一个综合性的分析框架。环境型政策工具旨在营造有利的发展环境, 通过间接引导促进职业教育; 供给型政策工具则侧重直接投入资源, 如资金、师资和技术, 以推动职业教育发展; 需求型政策工具关注通过外部刺激, 增加对职业教育的需求, 促进其内生发展。遵循这一分类标准, 对收集的 132 份省域职业教育政策文件进行了深入的内容分析与编码处理, 以科学地归纳政策措施, 形成以下的政策工具归类编码表^{[11][12]}, 为后续的量化分析提供标准化基础(见表 2 和表 3)。

表 2 省域职业教育政策工具归类和编码表

环境型政策工具	供给型政策工具	需求型政策工具
X ₁ (标准设计)	X ₇ (资金投入)	X ₁₄ (目标规划)
X ₂ (法律法规)	X ₈ (师资队伍)	X ₁₅ (职业培训)
X ₃ (公平机制)	X ₉ (示范工程)	X ₁₆ (海外交流)
X ₄ (税收优惠)	X ₁₀ (信息技术应用)	X ₁₇ (政府购买)
X ₅ (表彰激励)	X ₁₁ (引入资源)	X ₁₈ (集团化办学)
X ₆ (策略措施)	X ₁₂ (组织管理)	X ₁₉ (民办教育)
	X ₁₃ (多方治理)	X ₂₀ (区域协调)
		X ₂₁ (社会参与)

(三)趋同性分析

因子分析,进行适宜性检验,采用 KMO 样本测度法和巴特利特球体检验法,将数据录入 SPSS26.0,得到 21 项指标的 KMO=0.922,巴特利特球体检验(Bartlett's Test of Sphericity)的卡方(χ^2)值为 2 959.036,统计值的显著性概率是 0.000<0.01,说明矩阵具有相关性,并非独立矩阵,适宜作因子分析。

提取公因子,使用“主成分分析法”进行因子的探索性分析,抽取特征根大于 1 或者等于 1 的因子,转轴方法选用方差最大正交旋转法,得到降维后的公因子,有 6 个公因子初始特征值大于 1,其中,第一主成分方差为 19.303%,第二主成分方差为 16.085%,第三主成分方差为 15.847%,第四主

成分方差为 14.773%,第五主成分方差为 11.076%,第六主成分方差为 8.945%。这六个公因子旋转后的累计方差贡献率为 86.029%,即 6 个公因子解释能力占有所有变量 86.029%,提取的 6 个公共因子涵盖大部分原始变量所提供的信息,能有效解释分析结果。

因子载荷矩阵,提取的 6 个公共因子相互不相关,公因子具有合理性并且具有明确意义。因子分析将原来的 21 个数据变量降维到 6 个公共因子,分别命名为资金支持(F_1)、体系建设(F_2)、院校治理(F_3)、市场供给(F_4)、学习借鉴(F_5)、环境优化(F_6),这 6 个公因子能够更加清晰地对职业教育政策在省域的扩散与创新提供分析的维度(见表 3)。

表 3 省域职业教育政策主成分分析

因子编号	因子名称	关键变量	方差贡献率(%)	因子描述
F_1	资金支持	税收优惠、资金投入、示范工程、目标规划、政府购买	19.303	政府全方位资金投入,通过税收优惠、项目资金和政府购买推动职业教育发展,尤其在示范工程和目标规划上投资大,展现政府关键角色
F_2	体系建设	法律法规、组织管理、区域协调、社会参与	16.085	强调制度性建设,通过法律法规、优化管理、区域协同和社会参与,构建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职业教育体系,提供制度保障
F_3	院校治理	标准设计、策略措施、师资队伍、多方治理	15.847	促进院校自主性和创新,重视高标准设定、有效策略实施、师资力量建设和多方共治,提升院校治理效能
F_4	市场供给	信息技术应用、职业培训、海外交流、民办教育	14.773	反映市场化需求响应,通过多元化服务(如信息化教学、专业技能培训、国际交流合作、民办教育)满足市场对职业教育的多样化需求
F_5	学习借鉴	引入资源、集团化办学	11.076	强调对外学习与合作,通过引进国外优质教育资源和推广集团化办学模式,促进职业教育体系的国际化和现代化
F_6	环境优化	表彰激励、公平机制	8.945	政府通过表彰奖励和建立公平机制优化职业教育发展环境,旨在激发积极性并保障教育公平性,促进健康持续发展

研究分析发现省域职业教育政策趋同性不仅体现在政策重点的选择上,也体现在政策实施的整体导向与策略上。

1.政策重心的趋同性

大多数省份都将资金支持、体系建设、院校治理视为推动职业教育发展的三大支柱,这三个主成分因子的累计方差贡献率高达 51.2%,这反映出在省域层面,对职业教育投入的重视、制度框架的构建和院校内部治理效能的提升已成为普遍共识。这种高度的政策重心趋同性,表明各省份在面对职业教育发展的挑战时,有相似的优先级排序,即优先保障资金投入、强化制度建设和优化院校治理。

2.政府主导作用的一致性

无论是在资金支持还是体系建设上,政府角色都被凸显为职业教育发展的关键驱动力。这说明在省域层面,政府不仅是资金的主要提供者,更是职业教育制度设计和实施的主导者。这种一致性强调了政府在推动职业教育发展中的不可替代性以及,政府力量在资源配置和政策引导上的决定性影响。

3.制度与治理结构的共性追求

体系建设因子的高贡献率显示了各省份对制度化、规范化职业教育治理结构的普遍追求。这表明,尽管各地具体情况不同,但在建立法治框架、优化管理机制、促进区域协调等方面,存在共同的政策取

向,反映了对构建稳定、有序发展环境的共同需求。

4. 市场化探索的共识

市场供给因子的显著贡献揭示了省级政府在推动职业教育市场化和多元化供给方面的共识。各地普遍认识到职业教育与市场需求对接的重要性,通过信息技术应用、民办教育等手段,探索职业教育的多元化服务模式,反映了对提升职业教育适应性和竞争力的普遍追求。

5. 政策协同整合的共同挑战

尽管存在权威性政策工具的普遍使用,但环境优化和需求型工具的相对不足,表明在政策工具的综合运用和协同整合方面,各省份面临相似的挑战。这种趋同性挑战提示,在未来职业教育政策制定与实施中,需要更加注重不同政策工具的互补性,平衡权威性与市场化、环境优化与需求响应之间的关系,以实现政策效果的最大化。

(四) 差异性分析

采用一种综合因子得分法对观测对象进行分类,通过因子分析确定各因子在解释数据方差中的重要性,并根据其特征值为每个因子分配权重,以量化其对整体数据结构的贡献度,计算出每个省域职业教育政策的综合因子得分,该得分全面反映了观测对象在多个维度的表现。将具有相似特征的省域职业教育政策归为一类,以揭示不同省域之间政策的异同和内在联系,识别省域职业教育政策扩散和创新的执行效果和潜在问题。结合公式(2)综合因子(F)得分表达式如下:

$$F = 22.1\%F_1 + 18.98\%F_2 + 18.49\%F_3 + 3.8\%F_4 + 2.77\%F_5 + 1.92\%F_6 \quad (3)$$

对各省份的综合因子计算并进行整理排序如表4所示。

表4 各省份综合因子得分

省份	天津	广东	浙江	江苏	重庆	山东	河南	北京	四川	陕西
F	1.18	1.08	1.06	0.69	0.66	0.31	0.29	0.13	0.13	0.09
省份	湖南	吉林	河北	广西	湖北	福建	安徽	山西	辽宁	江西
F	0.07	0.07	-0.03	-0.09	-0.10	-0.10	-0.13	-0.16	-0.21	-0.22
省份	黑龙江	上海	海南	贵州	宁夏	甘肃	青海	云南	新疆	内蒙古
F	-0.30	-0.31	-0.31	-0.32	-0.32	-0.34	-0.35	-0.44	-0.45	-0.56

根据提取的6个公因子特征值和综合因子(F)得分,采用SPSS26.0聚类的组间链接法进行聚类。各主成分得分以0为分界线,得分数据小于0表示该省份职业教育政策供给水平低于平均水平,大于0相反,依据综合因子得分表(见表4)可以看出,第六类所包含的省份均值都在0以下,在具备相对聚合

性的同时,能兼顾类别差异性,故综合考虑将30个省份聚类为六类。分类后的各组主成分和综合因子均值见表5。

研究结果显示,不同省份在职业教育政策的侧重与实施效果上呈现出显著的异质性,表6展示了基于综合因子得分的各省份分类。

表5 分类均值表

类别	F_1	F_2	F_3	F_4	F_5	F_6	F (综合)
第一类	1.58925	3.880143	1.60434	-0.80461	0.55066	-1.05401	1.18
第二类	-0.55502	2.72080	0.04441	1.57769	1.84658	1.83479	1.08
第三类	0.23462	0.97288	3.80145	-1.25570	-1.00552	1.05902	0.66
第四类	1.24083	1.94453	-1.09730	0.08989	-0.37340	-0.79542	0.30
第五类	0.24721	0.65901	-0.23657	-1.17568	2.88476	0.52126	0.10
第六类	-0.18456	0.23737	-0.11711	-0.06923	-0.27889	-0.05615	-0.16

四、结论与建议

(一) 结论

通过对2019—2023年中国30个省级行政区职业教育政策的综合分析,系统揭示了政策在省域层

面扩散与创新的特征与机制,为理解我国职业教育政策动态演化提供了丰富的实证证据。研究核心发现集中于三个方面,即政策扩散的内在机制、政策扩散的地域性特征、政策工具的地域适应性与不均衡性,这些发现不仅深化了对职业教育政

策扩散机制的认识,也为政策制定者提供了实践 指导与策略启示。

表 6 各省份职业教育政策聚类分析

类别	省份	差异(特点)分析概述
1	天津市	资金支持和院校治理突出,综合运用供给型、需求型、环境型政策工具,建立了完善的政策体系,资金充足、院校治理高效,与当地发达的经济和成熟的治理体系相辅相成
2	广东、浙江	体系建设得分最高,学习借鉴和环境优化靠前,强调法治规划、区域协同及国际交流,反映出市场经济成熟地区对职业教育的市场化需求响应及间接治理策略
3	江苏、重庆	院校治理得分最高,环境优化与体系建设其次,制度安排牵引治理变革,注重发展环境营造,体现了政策工具使用的均衡性
4	山东、河南	体系治理得分最高,资金支持次之,强调政府引导与产业协同,体现了政府权威性管理的倾向
5	北京、四川、陕西、湖南、吉林	学习借鉴得分高,市场供给得分低,强调对外交流,内生动力转换尚待加强
6	黑龙江、上海、海南、贵州、宁夏、甘肃、青海、云南、新疆、内蒙古	市场供给与环境优化略高于其他因子均值,整体得分低,投入、规划不足,政策工具协同性不一致

政策扩散机制的理论贡献在于明确了中央权威施压与地方政府模仿机制在政策扩散中的核心作用,深化了政策创新与地方响应动态关系的理解,为政策扩散理论增添了新的实证依据。

政策扩散的地域性表现凸显了东部沿海省份在职业教育政策创新与实施上的领先地位,这与地区经济实力和对高技能劳动力的迫切需求紧密相关。东部省份通过构建全方位政策支持体系、推动市场导向和国际合作,为中西部省份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模式。中西部地区虽受制于资源限制,但在中央政府引导和同侪学习的作用下,正逐步加快政策采纳步伐,形成正向扩散循环。这一过程既强调了经济基础对于政策扩散的决定性影响,也揭示了政策工具选择中地域适应性和策略差异化的必要性。

政策工具的地域适应性与不均衡性分析揭示了政策工具在不同区域应用的灵活性与针对性,东部省份偏好市场驱动和国际化路径,而中西部则侧重政府引导与产业协同。这表明政策工具的选择需紧密结合地方经济需求与特色,强调均衡发展策略,以确保职业教育资源的有效配置和教育公平。

(二)建议

基于上述发现,提出以下结论性建议,旨在促进

职业教育政策的高效扩散与可持续发展:

1.政策工具的地域化定制与创新

鼓励地方政府结合本地产业发展蓝图,如制造业省份重点推行智能制造技能培训政策,农业大省则应加强现代农业技术教育项目,形成具有区域特色的职教品牌。建立政策工具库,分类收录各地创新政策案例,供其他地区参考借鉴。

2.社会资本激活与合作模式的深化推广

设立专项基金,支持 PPP 项目在职业教育领域的应用,如通过举办“社会资本参与职教发展”论坛,搭建政府、企业、学校等三方交流平台,明确合作规则与激励机制,加快优质实训基地和课程资源的共建共享。

3.数字化转型的路径与工具包

编制《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指南》,明确技术应用的标准与流程,如推荐适用的大数据分析工具、AI 辅助教学软件等,同时建立技术支持中心,提供技术咨询与培训服务,确保各地在技术应用上的平等与高效。

4.跨区域合作平台与资源共享机制的优化

推动“东西部职业教育联盟”等合作组织的建立,通过“东部带西部”的导师制度、远程教育共享平

台等,实现资源与经验的高效流动。建立定期互访与交流机制,促进先进经验的快速传播与应用。

5. 政策反馈与动态调整系统的构建

设计“职业教育政策执行与反馈信息系统”,集成大数据分析功能,实时监测政策实施效果,定期发布评估报告,为政策调整提供科学依据。建立由政府、行业、学校和第三方机构组成的多主体评估委员会,确保政策调整的科学性与民主性。

注释:

①根据数据的可得性,西藏自治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以及港澳台未列入研究范围。

参考文献:

- [1] JACKSON, L. W., et al. Understanding policy diffusion networks: Interstate policy adoption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speed and scope[J]. Journa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search and Theory, 2022(2): 287-308.
- [2] WALKER J L. The Diffusion of Innovations among the American States[J].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1969(3): 880-899.
- [3] 道格拉斯·C.诺思.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M].

杭行,译.上海: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 [4] E. M. 罗杰斯.创新的扩散[M].唐兴通,郑常青,张延臣,译.5版.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2016:22.
- [5] 朱旭峰. 三层级架构下的政策扩散机制与地方响应策略研究[J]. 中国公共政策评论, 2021(18): 53-72.
- [6] 朱旭峰,张友浪. 创新与扩散: 新型行政审批制度在中国城市的兴起[J]. 管理世界, 2015(10): 91-105.
- [7] 吴大伟, 李明浩. 中央政策地方化实践: 案例分析与策略启示[J]. 公共管理学报, 2023(3): 105-120.
- [8] 李阳. 省级政府推动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政策扩散机理[J]. 职教论坛, 2023(7): 5-16.
- [9] 黄勇, 孙丽. 数字平台在政策知识传播中的角色: 一个新的扩散渠道[J]. 电子政务, 2022(3): 115-130.
- [10] 张华, 王海波, 李娜. 职业教育政策工具的量化评估: 基于大数据分析模型的视角[J]. 教育评估与评价, 2023(1): 45-60.
- [11] 汤杰, 石伟平. 高等职业教育内涵建设的政策工具: 回顾与展望——基于 1995-2019 年高职政策文本的分析[J]. 教育学术月刊, 2020(1): 45-52.
- [12] 唐璟怡, 杨方正, 张文鹏. 技能型社会建设背景下职业教育政策的量化研究——基于 16 份国家层面政策文本的分析[J]. 教育与职业, 2023(10): 5-12.

Provincial Vocational Education Policy Diffusion and Innovation: Empirical Analysis and Strategy Recommendations

Zheng Qi Wang Tingting

(Zhongshan Polytechnic, Zhongshan 528404, China)

Abstract: This study, spanning from 2019 to 2023 and encompassing 132 vocational education policies in 30 provinces in China, employs quantitative methodologies to investigate policy diffusion mechanisms. It conducts a multidimensional analysis of the downward transmission mechanisms of central directives, intergovernmental mimicry, peer effects among local governments, and the deep-rooted connections between policy instruments and the adaptive imbalances in relation to regional economic structures. The research uncovers that direct and indirect interventions from the central level play a decisive role in shaping local policy formulation and execution. Meanwhile, the level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the state of social development of various regions significantly impact the selection and implementation outcomes of policy tools, manifesting in a gradient distinction between eastern and western provinces concerning the adoption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policies. Based on these findings, the study proposes strategies including customized policy tools, activation of social capital cooperation, advancement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ptimization of inter-regional collaboration,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feedback and adjustment systems, all aimed at fostering synergy between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Key words: Vocational education; Policy diffusion; Policy tools; Quantitative research